

老人福利政策模型的亞洲各型態之分析

莊秀美

壹、前言

人口高齡化已成為大多數工業化社會的普遍現象，亞洲各國也沒有例外。日本的人口結構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老化，已經列屬「高齡社會」之一。其他的亞洲新興工業國，如台灣、香港及新加坡各國，老年人口比率也是不斷上昇，都已經符合「高齡化社會」（註一）的條件。

過去，不論在解釋人口老化的現象，或研擬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社會政策，以工業化概念為基礎的聚合理論（convergence theory）主導理論分析的方向。亦即，過去提供個人多樣福利的家庭與宗族組織，於歷經資本主義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逐漸衰微甚或喪失原有的功能。而為了彌補家庭、宗族組織功能之不足，將（必須）促使福利國家（模型社會福利）（註二）之成立。

然而，畢竟聚合理論是歸納歐美各國的社會福利之歷史發展過程所建構的理論，是否足以解釋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於歐美社會體制

的亞洲各國（註三）呢？而且，福利國家型態的社會體制歷經危機、重整期，現階段仍陷於動盪局勢之中，顯然已脫離原有的軌道。而如果说亞洲各國無法避免人口老化的各種問題的話，如何建立適合其社會的社會福利模型是一緊急的課題。亞洲各國又如何取捨績效漸次受到質疑的福利國家模型社會福利體制呢？

本文以工業化程度、人口結構的老化趨勢等各種社會變遷都很相近的日本、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等亞洲各國為探討對象。這些國家都隸屬儒教文化圈，約略可劃分為日本社會與華人社會。藉此對照比較可望瞭解儒教傳統如何影響老人福利政策的制定。我們分析亞洲各國老人福利模型的特色，解析亞洲各國必須學習歐美各國之處，及亞洲各國中最早遭遇人口老化的日本經驗的啟示。最後探討建構亞洲型老人福利政策模型的條件。

貳、亞洲各國社會福利的發展

一、再論聚合理論

根據聚合理論，在資本主義主導的工業化過程中，因為家庭與社區共同體漸形衰微，喪失既有的保障功能，而導致各種社會問題的發生。爲了因應各種社會問題，以公共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爲基礎的福利國家模型的社會體制將隨之普遍成立。然而，即使是針對歐美各國，以資本主義爲立論依據的聚合理論並不能全面說明。

首先，John Carrier and Ian Kendall(1973: 209-224)指出，即使是針對工業化先進國家而言，經濟決定論也不能完全解釋它們的社會福利發展的多元性。以美國與紐西蘭爲例，兩國的經濟發展雖然比起西歐各國都要出色，但是社會福利的發展卻是相當遲緩的。這兩國的情況可說明工業化未必會促使社會福利的發展。而且，社會福利支出與GNP的成長指數也無正相關關係。Miller and Clark(1977: 382-400)對照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七三年之間美國GNP與社會福利支出的成長情況，發現兩者並無顯著的相關。O'Connor(1988: 277-299)調查OECD各國的社會福利支出與GNP成長的關係，也得到同樣的結論。

依照聚合理論所論，達到某種工業化程度的亞洲各國也將(應該)如工業化先進國一般，藉由擴張社會福利來解決社會問題，並且應該會逐步建構福利國家體制(星野信也，一九八一；南亮進，一九九一；富永健一，一九九二)。然而，直至目前爲止，亞洲各國雖然引進部分公共社會福利制度以減低社會問題的傷害，但是他們的社會福利政策依然殘存著強烈的救貧、殘補性質(residual)。

其次，社會福利未必就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有時也是助長經濟發展的動力。一九五五年開辦的中央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目前已成爲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的中心砥柱，但早期階段它對新加坡的經濟開發也是功不可沒。特別是強制貯蓄制大幅度提高國民儲蓄率，使新加坡得以維持充分的國內資金流通。社會保障的剩餘基金也被運用於投資國債，成爲政府經建計畫的重要財源。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結果，約有八成的國民居住在政府所提供的租賃住宅或貸款住宅，享受安定的生活。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以「財產形成制度」爲軸心，目的就在保護人們脫離疾病、老年、殘障、死亡等社會性危機，它的基本構思與福利國家社會制度是不同的(社會保障研究所，一九九五)。

關於台灣的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部分研究指出經濟發展或工業化是助長社會福利的主因(詹火生，一九七九；彭懷真，一九八三；蔡明璋，一九八六；郭登聰，一九八六)。而林萬億(一九九一)以長程歷史研究方法分析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發展的關係，指出影響台灣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並非GNP的成長，而是早期國際壓力及近年政治宣示的結果。

現階段，亞洲各國仍停滯於殘補性的社會福利(residual social welfare)，社會福利的角色是次級的，並未被置於同等於經濟、政治制度之層次(T.S. Herpell, 1973; T.S. Herpell, 1974; James Midgley, 1986: 上下好博，一九八七)。從亞洲各國對社會福利的消極性作法來看，聚合理論結合工業化與福利國家發展之論點，或許在解釋社會變遷上深具意義，但是它的理論延展性則是令人質疑的。工業化→福利要求→福利國家成立之單向公式並不能充分說明亞洲各國的社會內部結構與社會福利發展的關係。

在此強調亞洲的社會福利研究必須修正過去的思考方向，尤其欠缺社會文化背景的考量所提出的福利學習論調總是過於偏拗與非現實的。亞洲各國所擁有的獨特之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背景，與西洋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箇中尚有許多因子應該深入探究。社會福利政策若忽略成立過程的特性及條件，恐會失去制度的適應與效率。

二、社會福利的「後進效果」

二次大戰後，隨著美國門戶的開放，憧憬美國高度技術的亞洲各國派遣大量留學生前往學習工業技術、經濟發展之鑰。一九六〇年代之後，以日本為先驅，亞洲四小虎繼之，亞洲各國先後達到高度經濟成長階段。由於這些國家直接引進先進的工業技術，得以免除研發過程的冗長等待而迅速發展，可說蒙受到不少工業化「後進效果」(Late development effect)的利點(南亮進，一九九一)。

「後進效果」作用的概念常用來說明介入開發中國家工業發展的外力因素，在此用於社會福利領域，則意含社會福利的學習、擴張或警示作用。A.J. Kahn & S.B. Kamenman (一九八〇)調查歐美、中美八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指出，舉凡訪問、會議、討論、論文的交換等都是國際間學習的機會，頻繁密集的國際交流活動，促成國際間的社會保障措施都很類似，如收容式的老人福利機構，經常是跨越國界的大同小異。

亞洲各國遭遇工業化發展階段過程中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尋求解決對策成爲迫在眉睫的課題。因此，透過國際間的學習、模倣，

各國紛紛引進歐美國家的社會福利措施。就台灣而言，戰後許多社會救濟活動經由聯合國的指導而展開，至今許多社會福利制度仍然延續當時的規制(黃彥宜，一九九一)。早期台灣社會福利教育的資料也大都使用美國的資料。林萬億調查台灣的大學學院中社會工作系專任教師的學歷，發現目前任教於各大學院社會工作系的教師幾乎都擁有美國的留學經歷；他們在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之間主導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方向，因此他們負責執行的政策也就難免受到學習過程中烙印的意識型態所左右。實際上，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不少是美國擴散的產物。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亞洲各國開始思慮普遍式福利政策的可能性之際，世界性經濟恐慌爆發，福利危機論接踵蹶起。一九七〇年代福利國家的動搖局勢帶給亞洲各國莫大的警示，具體措施就是暫緩擴張社會福利。「日本型福利社會」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衍生(丸尾直美，一九八五)。接著，一九八〇年代持福利批判立場的新右派思潮湧至亞洲，華人社會各國也因此慎重考慮社會福利發展的適度性(詹火生，一九八五；周永新，一九八〇；下平好博，一九八六)。

亞洲各國一方面期待各種福利措施能解決多樣化的社會問題；然而方興未艾的福利危機論卻澆熄邁進高福利的希望。所以在社會福利的學習過程，它們採取保守的作爲，儘可能避免歐美國家的失敗經驗。因此高財政負擔的福利措施大都被排除在外。總之，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年間，亞洲各國深受當時社會福利的主流意識型態，福利危機論與新右派思潮所支配，對社會福利抱持消極的

態度。

三、亞洲各國的社會福利政策

亞洲各國的社會福利發展是由政治主導，鑑於福利國家的動盪情勢，普遍主義的社會福利並未受到各國當局者的青睞。日本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社會福利的發展開始融入本國文化，倡導「日本型福利社會」。「日本型福利社會」乃是結合公共部門、市場與非正式部門的力量，以社區照護、社區福利為基礎，鼓勵國民參與的「混合型福利」(welfare-mix)。一九八〇年代後期，日本景氣再度復甦，政府稅收充裕，「日本型福利社會」的論點曾經被指責為政府逃避責任的口實。然而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來，日本就陷入泡沫經濟的漩渦中。在經濟乏力不振的情況之下，以「日本型福利社會」的概念為出發點的「修正日本型福利社會」廣受關注。擁護者主張聚合理論已不足說明現今與未來的日本社會狀況；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除了必須參考歐美的作法之外，也必須考量自身社會文化的差異，強調「福利文化」的重視(金子勇，一九九三；小川全夫，一九九五)。日本的社會福利的發展過程中，早期以吸收歐美的社會福利政策為依歸，近年來回溯到文化原點，重新審視社會文化的定位。

說明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除了政治民主的發達、經濟發展的结果、文化擴散論等之外，強調高度國家自主性的國家中心論更能解釋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發展。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大都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首要考量，因此主要目的在穩定國家

科層體制，極少反應社會大眾的需求。自始以來，台灣的政治精英就奉自由經濟思想為圭臬，視社會福利體制為弊政。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決策者的理念仍然左右福利的發展。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執政黨權力的縮減與大眾的覺醒，全民健保與國民年金等全民性的社會福利政策得有實現的轉機。然而，福利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仍在，社會福利政策依舊是消極、選擇性的(林萬億，一九九四：二五三—二八四)。

從一九六五年以後陸續發佈的四部社會福利白皮書的內容可看出，香港政府抱持強烈的反福利國家意識，強調高度福利將養成怠惰的人格，削弱國民獨立自主的精神，阻礙國家的經濟發展(周永新，一九九三：一九五—二〇六)。對新加坡政府來說，助長國民依賴心、降低國民勞動意願的社會制度都是非生產性的，因此自建國以來，就拒絕接受可能招致國民喪失自助精神的福利國家制度(下平好博：一九八七；二木立，一九八七)。

華人社會各國同屬開發中國家，社會福利方面，政府與地方公共團體也從財政上、法制上開始逐步介入。目前的階段，社會福利的實施大半依賴民間團體；部分社會福利的相關法制雖然已經完成立法步驟，但實際上卻少有穩定的預算支付。

亞洲各國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表徵上與歐美各國大致相似。然而各國的福利文化是有差異的。其差異就在，政府、民間及家庭在社會福利領域中所執行的角色及其貢獻程度各有不同。也就是說，儘管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福利機構相類似，社會福利的價值觀依然有很大的差異。

叁、亞洲各國的老人福利政策模型

一、儒教傳統的影響

經濟技術的擴散學習是迅速、普遍的，然而社會文化的影響則是緩慢、限定的。Ronald P. Dore從個人主義的定著程度來論析文化擴散的理论，指出西洋的價值觀並不能輕易移植，因為價值觀的引進很少能改變一般國民的日常生活與基本的道德觀念（加藤幹雄，訊九九〇）。

從經濟、政治等社會結構的次元來看，無疑地，亞洲各國已達到一定水準的工業化；民主化的思潮漸次高漲；人口老化率扶搖直上；家庭型態趨向核心家庭，家庭功能與家庭意識衰微；這些社會變遷的現象都誠如聚合理論所論一般，但是我們也要特別強調亞洲各國在社會文化方面仍然保留相當的傳統儒教特質，特別是在提供老人福利需求的各種非正式組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

家庭與其他社會組織不同，一般來說，家庭以外的社會組織乃是基於合理的社會規則進行運作；相對地家庭關係經常是一種非合理性的互動關係。而且家庭是一具有強烈排外性的封閉體系，不是一局外者輕易就能融入的。從家庭關係可以瞭解老人生活的方式，而家庭成員的互動模式與關係維繫又是依循家庭制度進行，特別是年老雙親的扶養問題，是家庭於分割或分裂之際第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家庭制度的差異往往決定老人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家」制度（註四）及華人社會的「連邦式家庭」（註五）造就保守的

老人扶養型態。即使在現代，日本的長男繼承、扶養，華人的男子均等繼承、扶養的傳統家庭扶養型態仍然普及；一般人對老人福利機構的收容服務仍心存芥蒂。家庭的連結關係也不同於西洋的家庭關係，孝道倫理觀念依然受到重視，老人支持網絡仍以家庭成員為主，祖先祭祀也還是統合家庭連結關係的動力之一（莊秀美，一九九七）。

二、老人福利政策模型的亞洲各型態

爲了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近年來日本的福利改革從無間斷。從一九八九年的黃金計畫、翌年的福利八法及醫療保險法之改訂，到一九九四年的新黃金計畫等一連串的改革方案，都以應付高齡社會爲規劃前提。新黃金計畫中，揭示了以下四個基本理念：（一）案主本位、自立支援；（二）普遍主義；（三）提供整體性的服務；（四）社區主義，希望整合個人、家庭與社區，提供全面性的福利服務（厚生省，一九九六：四八四—四八八）。

日本一方面體認到所有的福利支出都由政府負擔是困難的，另一方面，放任由家庭等私人力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近年的各種福利措施都非常重視社區資源。從一九七〇年代的「日本型福利社會」，到一九九〇年代的「修正日本型福利社會」，老人福利政策除了延續過去強調的家庭功能之外，對社區有很高的期待。

華人社會各國擁有相似的社會、文化特色。無論在經濟考量或實際效益上，各國都深信「家族中心模型」比「福利機構中心模型」更能符合社會福利的基本原則及最終目標。希望藉此重整家族組

織，擴展老人的社會支持網絡（莊秀美，一九九七：一二七—一三四）。

亞洲各國在老人福利措施方面，有幾個共同點：（一）家庭中心主義。設定家庭為提供老人福利的主要來源，公共福利措施只是填補不及之處，非首要考量；（二）獨特的老人扶養規制。日本、台灣的民法、老人福利法，及新加坡在一九九五年公布實施的父母扶養法案（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對於老人扶養的責任歸屬、遺產等的罰則等都有詳細的規定。這些老人扶養規制僅見於東洋社會，從中也可看出儒教文化的特色（莊秀美，一九九七：一二七—一三四）。

肆、建構老人福利政策模型

一、歐美、日本經驗的啓示

以上整理亞洲各國老人福利的特色、及統括性的共同原理，目的就是希望能藉此預見今後亞洲各國老人福利模型的理想藍圖。在此我們先行探討亞洲各國建構老人福利模型時應該學習歐美各國之處，及亞洲各國中最早遭遇人口老化的日本的經驗能帶給亞洲其他国家什麼啓示。

比較福利政策的目的就在可望學習一些福利先行國的策略，領悟其成功的經驗及失敗的原因。我們在檢討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過程之後，深刻體認到社會福利政策必須因應每個社會的不同需要。在福利學習的過程，我們必須強化對原生文化的認識，才能建構與

文化相成的福利政策模型。我們知道，即使福利國家模型社會福利體制是美好的，也不能斷言它對亞洲國家就是合適的，況且福利國家模型社會福利也未必是唯一的選擇；如何建構適合亞洲各國的社會福利模型，才是亞洲各國在提昇社會福利的最大課題。因此，必須重新評估歐美社會福利模型對亞洲的適用性，摸索出亞洲福利文化的特性。至少以現階段而言，福利國家模型社會體制仍然危機叢生；福利國家模型社會福利對於歐美國家而言，也許在發展社會福利的試驗過程中具有深層的意義，然而畢竟它是依循與日本社會、華人社會完全異質的社會系統所建構的體制，在獨立的自覺性個人意識尚未成熟的東方社會裏，如果倉皇移植福利國家體制，最後可能流於空泛的表徵，造就一些生活低能的個人。

日本社會福利的發展在早期階段幾乎都是直接移植自歐美。當然這是明治維新之後「脫亞入歐」之經國策略引導下的結果。然而，這種無視社會文化特質的社會福利政策，在制定的出發點上就是踏出錯誤的腳步。時至今日，「脫歐入亞」的必要性為各界所強調。以近年來日本的社會政策走向來看，日本最後是回歸到「日本型社會福利」的原點。現階段，日本老人福利政策的走向受到亞洲各國社會福利專家的極大關注。因為老人問題已不侷限於西方社會，在短期間之內就會成為亞洲各國所共同的社會課題。因此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都需要老人問題對策的相關情報。日本摸索福利文化的成敗經驗，對於具備相近社會背景的亞洲其他國家而言實在有相當大的啓示作用。

二、建構亞洲模型的老人福利政策

(一) 老人福利政策的亞洲模型

亞洲各國雖然同屬儒教文化圈，但是日本社會與華人社會原本就有許多差異，同屬華人社會的台灣、香港、新加坡當然也是各有特色，因此各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模型就應該有所差異。就像歐美國家的社會福利模型，也分為北歐模型、西歐大陸模型、美國模型等各種類型一樣，「亞洲模型」社會福利模型並非指亞洲單一模型，換句話說，亞洲各國的社會福利模型應該是異質(Divergence)、多樣的。不過無論是西歐模型、日本模型、台灣模型、或香港模型，社會政策的制定應該以人性尊嚴為前提，合乎社會文化體制。同樣地，老人福利政策的制定必須考量國家本身的經濟結構、政治成熟的程度、及社會·文化制度的傳統。

針對亞洲各國的文化特質，以下嘗試描繪出亞洲各國社會福利模型的輪廓，並提出幾點有關老人福利的具體措施之淺見。對日本來說，目前最緊急的課題無非是重整漸次失去功能的地緣共同體；而對血緣關係依然具連結功能的華人社會各國來說，重要的是擴展以血緣關係為主的支持網絡，並建立一廣泛的地緣共同體。亞洲各國的老人福利政策的共同課題就是建構一地緣共同體，這正是社區主義社會福利模型所強調的。

社區主義福利模型的理念基本上是延續北歐正常化的理念而來，而正常化理念乃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反機構收容主義發展而來。因為機構收容的隔離方式不但非人道，而且是低效率的，所以將案主留

置於原來生活的社區，不但可讓案主保持原有的非正式社會關係，也可削減機構收容的過度支出。在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模型之中，社區主義社會福利模型可說是一折衷性福利模型。對那些陷於福利國家危機論迷惘之中，躊躇於自由主義國家或福利國家體制的亞洲各國而言，具備折衷性質的社區主義福利模型無寧是最安全的選擇。現階段，以在宅服務為中心的社區主義福利模型為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各國老人福利措施的主流。

(二) 福利人力的確保

社區主義福利模型的重點之一為社區照顧。為了使社區照顧能持續，首先，必須捨棄過去以家庭成員為中心的「自然形成支持網絡」所構成的社區社會的想法，統合嶄新的社區支持網絡，也就是「意識性的支持網絡」，具體而言，就是家庭以外的成員，如鄰居、朋友及志工團體等組成的支持網絡。特別是家庭功能日漸衰微，只有超越家庭的支持網絡才能維持持續性的支援。社區主義福利政策的實現，除了社會福利專業人員的人力之外，非正式組織的人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整合「意識性的支持網絡」的成員可發展為一組織性志工團隊，充實社會福利人力。

針對現今的志願服務行為，鈴木廣研究志工活動的參與情況與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指出，參與志工活動的人集中在社會階層、所得、學歷很高與很低、兩極的現象；而中產階層卻很少參與(鈴木廣，一九八七)。「地緣關係」對志工服務的積極性(參加的意願)、實現性(意願是否付諸實際行動)、持續性(行動是否持續)皆有正面的效益(稻月正，一九九四)。

志工是充實社會福利人力的重要一環。如何促進中產階級加入志工服務活動除了妥善施行各種激勵措施以外，志工的有效管理也是維繫志工服務的方法。近年以來，日本有志工憑證制，台灣有志工連線計畫的實驗。類似的志工人力銀行的構想，強調人力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讓人力成爲新的「愛的通貨」，「友情」成爲志工人力銀行的利息。將時間視爲次於「物物交換」與「貨幣經濟」的「第三經濟」（田中尚輝，一九九六）。志工活動使人們有效活用生涯生活，透過參加互助活動，增進自我成長。志工人力銀行結合「時間」與人的能力開發與互助精神，未來在亞洲各國社會福利方面的貢獻應該是可期待的。

伍、結語

亞洲各國老年人口比率都已達到高齡化社會的水準，而且根據人口成長之預測，今後仍將持續老化，因此如何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爲亞洲各國不可避免的課題。因此，人口老化問題的對策必須整合於社會福利政策體系，才能應付高齡社會的各種狀況。

最後，對於尚在變遷中的亞洲各國，至少在目前的階段，有些變遷的方向是我們所無法預見的。再者，亞洲各國的老人福利政策或社會福利政策今後的動態，尙有許多變數存在。在此我們提出幾點未能掌握的問題。我們將這些問題分爲巨視與微視兩個層面來說明。前者爲亞洲各國面對的共同課題；包括工業成長的前景、家庭與婦女角色的變遷方向、及社會福利的國際化問題。後者爲各國各

自面對的問題；包括日本的財政問題、台灣與香港的政局情勢、及新加坡的社會民主主義動態等都未見明朗。以上這些問題都將會影響亞洲各國老人福利政策、或社會福利政策制定的未來發展方向。另外關於亞洲各國的，家庭傳統習慣、孝道倫理觀念、及保守的老人扶養型態等儒教傳統特質，都是福利文化的決定性要件，目前尙無明確的測量指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作者現任東吳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附註：有關本文議題的進一步分析，請參考筆者所著論文「高齡者福祉モデルのアジア的諸形態に關する研究—日本社會と華人社會との比較分析」（一九九七，博士論文，日本久留米大學大學院比較文化研究科）。】

註釋：

註一：老年人口比率在七%至十四%之間者爲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比率超過十四%者爲高齡社會。

註二：在此，福利國家乃指以公共部門爲社會福利服務的主要提供來源，並強調社會福利的積極、普遍主義之社會體制。

註三：以下若無特別標示，本文中稱的亞洲各國泛指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

註四：包括重視父系的單系親族關係，祖先崇拜，家族一體感、認同感、家長長制，權威式教養，身分的差別與序列，財產的單一繼承。

註五：子女即使結婚、各自組織獨立的家庭，仍然以父母爲軸心，

保持緊密的聯繫。因此，各自的家庭雖未同居同財，社交、宗教活動等對外交涉則多以父母為名或遵循父母之統率。聯邦式家族可視為擴大家庭適應工業化社會的調整型態（莊英章，一九七二，「台灣農村家庭對現代化的適應——一個田野調查實例的分析」，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期，台北，中央民族研究院）。

參考文獻

- 林萬億 我國社會福利事業與研究的發展 中國社會學刊 第十五期 一九九一 頁七四—一一九
- 林萬億 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 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 周永新 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政策 香港 敦煌書局 一九八〇
- 周永新 社會福利十二講 香港 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三
- 彭懷真 我國的工業化與社會福利的演變 碩士論文 台北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一九八三
- 郭登聰 我國社會福利政策制定因素的探討 著重經濟因素的分析——以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為例 碩士論文 台北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一九八六
- 黃彥宜 台灣社會工作發展 一六八三—一九八八 思與言 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一九九一 頁一一九—一五二
- 詹火生 社會福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地位 社會建設 第二
- 三十六、三十七期 一九七九 頁十四—二十
- 詹火生 從西方福利國家發展取向談我國社會福利建設 社區發展季刊 第三十二期 一九八五 頁九—十三
- 蔡明璋 台灣經濟成長與福利發展關係的檢討 社區發展季刊 第三十三期 一九八六 頁五十二—五十六
- A. J. Kahn & S. B. Kameron, (1980). Social 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245,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 James Midgley, (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Welfare: The Case of the Four Little Tigers", in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3), PP.225-238.
- John Carrier and Ian Kendall, (1973).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Explan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3), PP.209-224.
- T. S. HePell, (1973).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Welfare: A 'New Look' from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3), PP.225-238.
- T. S. HePell, (1974).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Welfare: A 'New Look' from Hong Kong, Part Two", 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2), PP.113-126.
- 稻月正 一九九四 ボランティア構造化の要因分析 季刊社會保障研究 二九 四 頁三三四—三四七 日本 社會保障研究

所

狀況 日本 恒星社厚生閣

加藤幹雄訳 ロナルド・ドーア著 一九九〇 廿一世紀は個人主義の時代か：西歐の系譜と日本 日本：サイマル出版社 (Ronald

金子勇 一九九三 都市高齢社会と地域福祉 日本 ミネルヴァ書房

P. Dore, 1990, Will the 21st Century be the Age of Individualism?, The Simul Press, Inc, Tokyo, Japan)

鈴木廣 一九八七 ヴォランティア的行動における「K」パターンについて—福祉社会学的例解の素描 哲学年報 四十六 頁

厚生省 厚生白書 一九九六年版 頁四八四—四八八 日本 (財)

田中尚輝 一九九六 市民社会のボランティア—「ふれあい切符」の未来 日本 丸善ライブラリー

社会保障研究所海外保障情報幹事 一九九五 シンガポールの社会保障制度 海外社会保障情報 一一〇 頁六二—七四 日本 和光企画出版株式会社

富永健一 一九九三 日本の近代化と社会变动—デューピングラ講義 日本 講談社

下平好博訳 一九八四 福祉国家と平等—公共支出の構造的・イデオロギー的起源 日本 木鐸社。(Harold L. Wilensky,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二木立 一九八七 シンガポールの社会保障、海外社会保障情報 八一 頁二—十四 日本 和光企画出版株式会社

下平好博 一九八六 開發途上國の社会保障制度—シンガポールにおける一つの實驗 海外社会保障情報 二二三 一 頁三八—五八 日本 社会保障研究所

丸尾直美 一九八五 日本型福祉社会 日本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南亮進 一九九一 日本の経済發展 日本 東洋经济新报社

下平好博 一九八七 アジアのNICsの社会保障制度—シンガポールと香港の比較分析 季刊社会保障研究 二二三 一 頁九四—一〇七 日本 社会保障研究所

星野信也 一九八一 アジア太平洋八ヶ国中心の高齡者福祉調査 海外社会保障情報 五十六 頁三十八—六十九 日本 和光企画出版株式会社

小川金夫 一九九五 地域の高齡化と福祉—高齡者のコミュニティ

光企劃出版株式会社